

为
什么
写作

——当代著名作家讲演集

主编 王 邑 林建法

郑州大学出版社

我为 什么 写作

——当代著名作家讲演集

主编 王尧 林建法

郑州大学出版社

30052
971 - 6999970

000
2005年1月第1版

1
9787309052005

9787309052005

郑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大学路

邮编：450047

电话：0371-6999970

网址：http://www.zzup.com.cn

ISBN 7-309-05200-5

定价：20.00元

（凡购书50元以上者，

均可获赠精美书签

一张，赠完即止）

ISBN 7-309-05200-5

定价：20.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为什么写作——当代著名作家讲演集/王尧,林建法主编.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5

ISBN 7-81106-069-8

I. 我… II. ①王…②林… III. 当代文学-文学
创作-中国-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3298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40号

出版人:邓世平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 × 1 010 mm

印张:19

字数:248千字

版次:2005年5月第1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1/16

印数:1~6 000

印次:200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81106-069-8/I·8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在文化转型中重新出发(代序)

王 尧

在叙述、概括近20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程时,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已经无法像80年代初中期那样得心应手。随着文化转型、知识界的分化,90年代以来的汉语写作现象纷纭,这使得研究者多少有些神情恍惚甚至转移视线或者转换学术跑道。如果我们把这种状况仅仅视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与当下文化语境有某种抵牾,显然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其实,作家和批评家一样也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矛盾冲突,90年代以来文学进程同样裸露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无所不在的困惑与矛盾。尽管我们不能宣告审美主义的终结,但是,在不断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现代性、文学的语境等都不能没有困惑和追问。在我自己带着一分坚定、一分困惑和一些作家对话时,我想到的问题之一是:当我们匆忙地面对纷纭的写作现象时,我们是否可能静下心来通过观察、研究一些作家而发现90年代以来特别是当下文学写作的大致轮廓(我暂时放弃使用“主潮”或“主线”这类概念)?

我所说的“一些作家”是指应邀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的小说家:王蒙、莫言、李锐、张炜、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余华、叶兆言、尤凤伟、方方、阎连科、格非、李洱等。如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算起,这一批作家中的大多数差不多有了近20年的创作历史。他们从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新世纪,这样的创作历程独具文学史意义。有一批作家在20年中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这是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少有的现象。以他们及其他一些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和“现代文学”的作家

做些比较,就会获得“当代文学”的自信。坦率说,在既有的当代文学史框架中,由于某种理论体系、知识背景以及著作体例的限制等原因,一些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一些被接纳的作家也常常因为条分缕析而失去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事实上,这批作家90年代以来的状态比我们目前所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作家的写作和写作的处境。

不可否认,和其他作家一样,他们也无法避免文化转型带来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在考验着他们的品格,而且首先考验着他们作为思想者的品格。一些治思想史的学者对文学研究者转换跑道写些思想史的论著常有微词,从专业的训练与学科的分工看,这些想法也许不无道理;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近20年来,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又是当代思想领域十分活跃的思想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李锐、张炜、莫言、史铁生这一批作家突出的思想能力和理论路径为当代思想文化带来了丰沛的素质和活力,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独到见解,使当代汉语写作真正有了“思想问题”。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们不是简单地处理历史,而是反对简化历史和改写历史,反对以简化历史来寻找塑造现实的根据。譬如韩少功对中国卷入全球化后权力与资本问题的剖析,张炜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莫言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评价,李锐关于建立当代汉语主体性的识见等,都充满了真知灼见。这些作家,包括余华和叶兆言同样都对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原点的五四有着深刻的反省。我们未必完全认同他们在诸多问题上的看法,但必须承认,以这批作家为中心,中国当代作家已经拥有了自己阐释“中国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且是非常执著的立场,这一点可以由韩少功、李锐、张炜自90年代以来的著述看出。尽管史铁生不赞成“立场”的提法,但他对信仰的坚定,和前面说到的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如果只是以“左翼”还是“右翼”来认识他们,就会歪曲他们的思想意义。

显然,中国当代作家的思想模式发生了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性”话语激发下生长起来的种种文化想像开始落实到“中国问题”上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当一个成熟的中国作家能够抚摸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本土历史资源,能够强烈感受自身亲历的文学经验时,他就必须再次返回自身,重视本土经验,重视自身的传统,从而摆脱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对自我的桎梏,这就如李锐所说“永远抗拒被‘克隆’的眼睛”。在前面我已经说到他们对历史资源的态度,而在如何处理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这个问题上,这批作家都显露了作为大家的胸襟与识见。和一些人急于突出“80年代”以延续并确立当下的话语权不同,也和一些人与急于否定“80年代”以突出各种“新生代”相异,他们对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抱着审慎的、反省的态度。在今天的立场上看,作为重要思潮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无疑受到西方“现代性”话语过多的牵扯,但是这些思潮、对80年代最深刻有力的反省恰恰来自这些构成了“80年代”文学的作家们。这和“70年代出生”的一些作家急于独树一帜不同,莫言、张炜、韩少功、李锐、贾平凹、余华他们这批作家并不急于把自己经典化,尽管在他们这一代作家中也有个别人有这样的企图。他们在当下的反省,与他们在当时推动那些思潮的发展相比,已经有了不完全相同的文化语境,他们自身关于“西方”的知识背景和认识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就像今天许多文学研究者不时逾越出理论的边界去创作一样,莫言、张炜、韩少功、李锐、余华他们虽不作理论状,但对一些重要命题思考时所表现出来的理论锋芒和精神力量,常常是我们这些职业的学者或批评家所欠缺的,他们所表达的一些思想甚至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我一直觉得作家在阐述理论问题时通常带有源自创作的质感。这几年来关于民间问题的讨论沸沸扬扬,莫言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民间,认为所谓的民间写作,最终还是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而这个问题牵涉到“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莫言提出了两种创作态

度: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莫言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关涉“民间理论”,而且也与多年来流行的一些重要文学观有大的不同,可惜没有引起文学界的重视和呼应。张炜则对“伪民间写作”和“伪民间立场”表现出高度的警惕,他认为“民间写作”只须一步之遥即可以滑到另一极去,这一点不可不察。李锐这几年来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建立汉语的主体性,这个问题当然非李锐一人可以说清楚,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而且表达了自己对此的理解并付诸实践,应当看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一份收获。如李锐所期待的那样,我们这些后来者,要用自己的作品建立起现代汉语的主体性,要用自己充满创造性的创作建立起现代汉语的自信心。近几年来,余华对外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解读,叶兆言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人的分析,都显示了相当的学术水准和分量,几乎不让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在这一批作家中,韩少功也许最具理论家风采和理性的穿透力,他对文艺理论和思想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是广泛而且深入的,他的随笔集中了他这方面的成果,新近出版的《暗示》则是一个叙事性的理论作品,他重新解读了一些中国典籍并质疑流行的西方理论。

在这里,我们当然还要提到他们与“现实”的关系,这在今天并不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具有了上述的那些特征,他们与现实的关系不再如以前那样局促、那样慌张,而是沉着、从容的回应,浮躁之气已经荡然无存,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很难用“边缘”、“批判”等措辞来描述。我所感受到的是他们沉潜的品格和正在逐渐形成的大家风范,这使我或者我们有理由对他们的未来怀有更大的期待。无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在当下不可能没有困惑和困顿。这几年来,关于他们的创作的评价充满了分歧,有的几乎是南辕北辙,譬如批评界对莫言的《檀香刑》和张炜近年来的长篇小说的评价。这也许表明关于“文学”我们已经没有“共识”,作家以往被

认可的作品已经成为批评的一个参照系,纷纭的写作现象又干扰着批评家的视线。而在作家自己,他们虽然在转型中不断探索,但是似乎还没有寻找到已经变化了的自己表达已经变化了的世界的最佳方式。这甚至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和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不同,那个时期文学的灿烂景象是累积在五四以来现代中国人的感情与精神历程之上的,尤其是直接面对了“文革”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在此之前,我们无论文学、思想文化还是在体制上都经历了很长的非常时期,所以在新时期初,创作和学术只要发出正常的声音都会产生回响。显然,今天的文学生产要比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要复杂得多了,它已经不仅仅是作家写小说或者创作别的什么文体,文学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天所有的作家几乎都处于大变动之中。显然,用习惯了的方式创作出的新作品,即使不亚于当年的高度,但在读者和批评家的视线里还是低了许多。一些作家长时间在写一部作品但至今未问世,正表明了这些作家在告别往昔,这正是—个酝酿创新的过程。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作家们因其敏锐而感受到比常人更多的变化,他们在调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是一个无法说出时间长度的“磨合”期,但创作生命力的爆发就在“磨合”过程中的“—刹那”。

我想,没有一个小说家会永远明白小说怎么写,永远明白小说怎么写的从来都是自以为是的批评家。这正是我今天的困惑之一。我在文章中提到的这批作家,他们打动我的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和追寻,于是挫折、困惑和诋毁都不能挫败他们。我曾经说过,这是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的标志。

(注:这是王尧应约为2002年11月23日《文汇报》撰写的关于“小说家讲坛”的文章,略有修改。“小说家讲坛”2001年设立于苏州大学,由王尧、林建法策划、主持,复旦大学栾梅健教授也曾参与部分工作。)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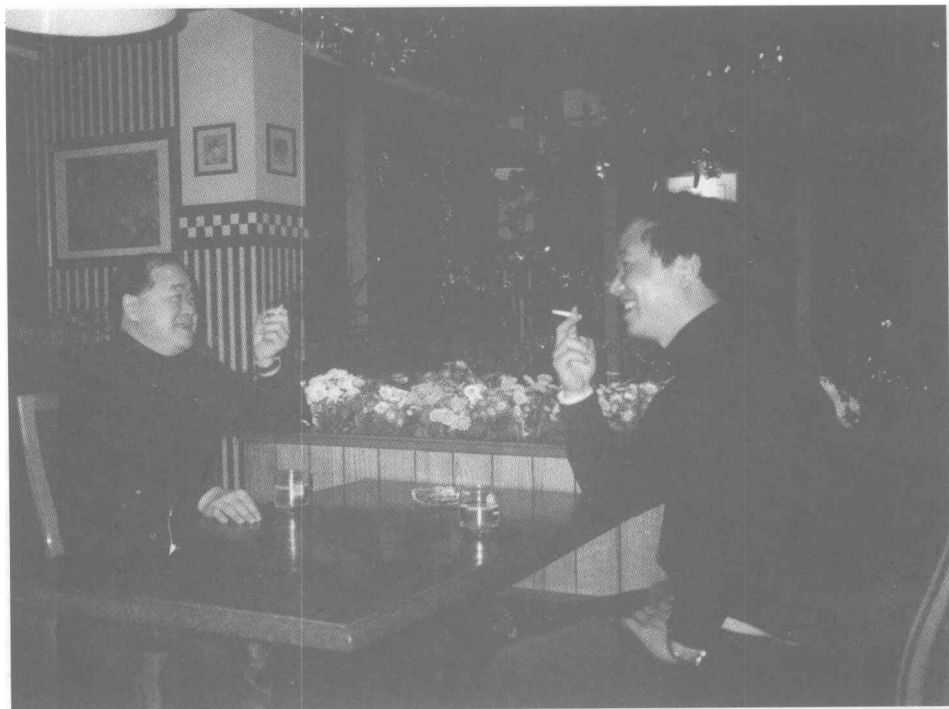
- 莫 言 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
1
- 李 锐 春色何必看邻家
——从长篇小说的文体变化浅议当代汉语的主体性
13
- 张 炜 世界与你的角落
29
- 余 华 我的文学道路
59
- 尤凤伟 我心目中的小说
89

- 叶兆言 写作与学问
107
- 贾平凹 关于语言
119
- 史铁生 宿命的写作
129
- 方 方 我写小说:从内心出发
143
- 韩少功 冷战后:文学写作新的处境
165

- 铁 凝 “关系”一词在小说中
193
- 阎连科 我为什么写作
205
- 李 洱 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
223
- 格 非 中国小说与叙事传统
237
- 林 白 生命热情何在——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
261

范小青 别一种困惑与可能
273

蒋 韵 我们正在失去什么
281



莫言(左)与王尧在苏州

莫 言

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

主持人的话

王 尧

“小说家讲坛”的构想，源于我和林建法 2001 年 8 月大连聚会时的讨论，并很快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的赞成与响应。这一活动将由两部分组成：在苏州大学设立“小说家讲坛”，同时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小说家讲坛”的专栏。

这个讲坛的设立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在这个讲坛上演讲的小说家堪称是杰出的甚至伟大的作家。关于“杰出”或“伟大”的提法，或许暂时不为一些人接受，但我们相信以后的文学史会做这样的叙述。熟悉百年中国和世界文学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这 20 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但我们常常由于莫名其妙的思想与心理作用，不敢或者不想做这样的表述。我以为这是最糟糕的失语。

建立起一个凸现作家主体而又易于与学者、批评家、文学读者沟通的充满活力的“文学现场”，是“小说家讲坛”的又一企图。在这样一个文学现场，作家的言说是自由的朴素的，读者的置疑也是自由与

朴素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对话。我们所期待的当代文学批评不作知识的考古,具有现场感的听众(包括批评家)的置疑和作家的回应,将淘汰文学研究中的伪问题,筛选出真正的关系到当代文学发展的问题,进而形成一些值得研究的命题。

多少年来,大学的文学教育是残缺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失败的。体制内的知识生产,封面是学术,正文却远离学术。我们所有的人只要你怀抱学术良知,就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文学教科书充斥着千篇一律的、八股式的说教,人性的、审美的、生命的文学在教条主义的叙述和所谓的研究中被肢解和阉割,并且要一种话语体系协助形成文学的权力和秩序。在堂堂的文学讲坛,缺席的是真正的文学。所谓大学不能培养作家正如大学应该培养作家一样都不是大学的真谛,我们反对以学术的名义驱逐文学。“小说家讲坛”的设立,将会有助于改变这一现象,尽管这样的改变可能是微弱的。

这个讲坛是有高度的。文学从来就有高度。我们邀请真正杰出的小说家走上这个讲坛,保持它的高水准,而不降格以求。在莫言、李锐之后,我们还要邀请一些作家主讲,让这个讲坛成为透视当代文学演进历程的一个侧面。

用“民间”理论解读莫言已经成为评论界的“常规工作”,而莫言的“夫子自道”又是如何呢?他的题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的演讲,提出了独特的看法。莫言在演讲中提出“作家的创作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为老百姓写作,一种是作为老百姓写作”。他选择“作为老百姓写作”这样一种方式。我以为,莫言关于两种写作的界定与区分,不仅对正在深化的民间理论有所拓展,而且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偏见,将会在文学界发酵。

演 讲

能来环境如此优美、历史如此悠久的苏州大学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但同时也感到这是一场冒险。因为作家大都是不善言谈的,我又是作家中最不会讲话的一个。当年我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不要说话或尽量地不说话,但结果还是要不断地说话。这是我的矛盾。譬如来苏州大学玩耍是我愿意的,但来苏州大学讲话是我不愿意的。来苏州大学不讲话王尧先生就不会给我报销机票,因为,我既想来苏州,又不想自己买机票,所以就只好坐在这里讲话。这是一个无奈的、妥协的时代,任何人都要无奈地做出妥协。

前几天,我和阿来、余华在清华大学与格非的学生们座谈了一天,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还有一场。我们讲得很少,大部分时间是学生提问我们答问。我们感到这样很好,不像摆开一个讲课的架势那样一本正经,又很有针对性,很随便,很亲切,完全是赤诚相见,彼此都有收获。我希望今天我们也能采取这种方式。在我讲的过程中,你们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随时递条子,或者站起来提问。总之我们合伙把这台戏唱下来,让王尧愉快地给我报销机票。

今天这个演讲的题目,直到昨天我还没有想好。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但昨天王尧给我打电话,说必须有一个题目,否则不好出海报,我说那就叫做“试论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吧。

“民间”是一个巨大的话题,也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好像最早是上海的陈思和先生最先提出,然后各路英雄群起响应。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各有各的理解,因此也就各有了各的民间。我作为一个写小说的,当然也有我对民间的理解。我的理解肯定没有理论家们那样系统,那样头头是道,但都是根据我的文学经验和创作体会得来的,也许会对大家有所启发。我还要坦白地说,今天这个演讲的题

目,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上个星期在清华时,听阿来说他最近给《视界》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小说创作的民间资源》,我仓促之间把它改头换面拿来搪塞王尧,阿来将来要跟我理论,同学们可以作证就说我已经公开地坦白了。

关于沸沸扬扬的民间问题的讨论,同学们都是学文学的,肯定都知道的很多。在此我就没有必要一一介绍——其实我也介绍不了。我认为所谓的民间写作,最终还是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问题。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为什么写作。过去提过为革命写作,为工农兵写作,后来又发展成为人民写作。为人民的写作也就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这就引出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你是“为老百姓写作”,还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为老百姓写作”听起来是一个很谦虚很卑微的口号,听起来有为人民做马牛的意思,但深究起来,这其实还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其骨子里的东西,还是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代言人”、“时代良心”这种狂妄自大的、自以为是的玩意儿在作怪。这就像说我们的官员是人民的勤务员一样,听起来很谦卑,很奴仆,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官员,根本就不是那样一回事。如果当了官真的就成了勤务员,就成了公仆,那谁还去当官呢?还跑官要官干什么?

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不能算作“民间写作”,还是一种准庙堂的写作。当作家站起来要用自己的作品为老百姓说话时,其实已经把自己放在了比老百姓高明的位置上。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

当然,任何作品走向读者之后,不管是“作为老百姓的创作”还是“为老百姓的创作”,客观上都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作用,都会或微或著地影响到读者的情感,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不会也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